

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

蔡 燕 梅

内容摘要:尺牍选本的编刊在明末成为一时风气,经历鼎革之际的急剧衰退,继而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其中,清初新刊的三部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与《尺牍新语》非常盛行,大获商业上的成功。以上各书皆以“新”为编纂旨趣,足见对原创性之重视,但又有研究者指出《新语》是对《新钞》的恶劣“盗版”,二者之编刊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那么,为何“盗版”能如此畅销,又如何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了先机?显然,将《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语》初编以刊本著作为主要材源,并加入少量包括编者在内的时人作品,这是承袭明末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的手法;为提升选本的商业竞争力,《新语》续编采取以下策略:充分发挥编辑群的人脉资源,获取大量时人作品,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该系列尺牍选本在取材与编法上的新变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选本对收录作品篇幅长短倾向的调整,一方面是清初文坛主流的古文观念波及尺牍文体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是尺牍文体自身的缺陷难以克服,选家试图借助文体边界模糊的“书”文体作品来增强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关键词:《尺牍新语》 编纂 尺牍选本 商业出版 文体观

明末尺牍选本编刊成为一时风气,可以追溯到嘉靖、万历年间。其后,虽然于鼎革之际曾一度急剧衰退,但随时局渐趋稳定,尺牍选本商业出版热潮于清初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尺牍兰言》的编者如此描述当时尺牍选本的出版盛况:“《藏弃》《新钞》诸种刻于白下,《初征》《新语》诸集刻于武林,脍炙字内,不胫而驰。金闾独无刊本行世。”^①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为周亮工等辑

^①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凡例》,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尺牍新钞》(以下简称“《新钞》”)三选(一选《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与汪淇等辑《尺牍新语》(以下简称“《新语》”)三编(《尺牍新语初编》二十四卷、《尺牍新语二编》二十四卷与《尺牍新语广编》二十四卷)。罗琴《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①一文,敏锐地洞见这两种清初最畅销的尺牍选本关系之错综复杂,揭示了《新语》各选对《新钞》系列选本不同程度的沿袭,论据翔实,考证充分。该文以实物版本学方法为主,侧重对《新钞》三选不同印次面貌差异的描述及先后顺序的排定。罗琴虽然将《新语》定性为恶劣“盗版”,但也承认该系列选本的影响力、知名度呈上升趋势,所收作品有短小的优点,且有保存大量独一无二文献之价值。那么,为何所谓恶劣“盗版”能“脍炙宇内”?又如何能如其所言“沿袭率下降”、“逐渐成长并独立”,且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先机,甚至促使实力派竞争对手周亮工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在所辑《新钞》系列选本的后续刻印中进行大规模的改易^②?

本文拟将《新语》三选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尝试在此过程中对上述诸问题作出解释,进而梳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并对该类选本所呈现的尺牍文体观之演化予以阐发^③。

①罗琴:《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文献》2019年第1期,第21-49页。

②顾青先生也在该期《文献》“编纂与出版”专栏导言中指出明清出版业中的“盗版”与当代法律层面上的侵权盗版显然不同,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深入开掘“尺牍何以成为出版热点”、“两种尺牍出版物在什么区域什么程度上出现商业竞争”等问题所具有的研究意义(《文献》2019年第1期,第31-32页)。

③明末清初尺牍选商业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有David Pattinson “The Market for Letter Collec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28(Dec., 2006), pp. 125-157一文。该文着眼于书籍流通的“营销”与“阅读”阶段,以1660年代新刊的四部当代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三选、《尺牍新语》三编与《尺牍兰言》)为主,讨论其盛行原因:其一,对于地方上受过良好教育但经验不足的尺牍作者而言,从用语到想法都极具参考价值;其二,不仅是明末清初文化界信息来源,更被视为文化界思想与行动的指南;其三,是保存明朝文化共同记忆的载体。“营销”与“阅读”都是书籍流通的重要环节,此课题不仅具有书籍流通史与阅读史研究的价值,也有拓展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意义。不过,该文以作品分类情况为主要依据推断清初尺牍选本的“营销”与“阅读”等情形,其中若干推断尚须进一步论证。笔者认为,关于这些尺牍选本编纂问题的详细考察,或可提供探索此类书籍“营销”与“阅读”等问题之路径。

一、脍炙字内之“盗版”：《新语》初编取材与编法

《新语》初编二十四卷，题“西陵徐野君/汪憺漪二先生笺论”。是书紧随同类出版物李渔辑《尺牍初征》（1661）与《新钞》一选（1662）之后，编刊于康熙二年（1663），与此二书皆为清初盛行的尺牍选本。《新语》初编全书共收作品 645 通，分为二十四类，每卷各为一类，卷首载小引，尺牍篇名以下标注来源，篇末附评语。

与《初征》《新钞》相似，《新语》皆标举“新”的编纂旨趣，例如，选本以“新”命名。并且，《例言》首则“务采新奇”曰：“朝华夕秀，贵得其时；人旧衣新，各从所适。欲驱尺牍之滥，不废寸阴之功。”^①所谓“尺牍之滥”与前引李渔之“陈言”，当同指明末以来流布四方之尺牍选本，表明以“新”驱“旧”之立场。又“广蒐稿集”条曰：“珊瑚在渊，必有资于铁网；璠璵在璞，端有藉于玉人。虽遐方未及征求，而秘本尽多探索。人各标其姓氏，书各署其篇名，昭如列眉，灿如指掌。”^②对该尺牍选本作品来源及编法略加介绍。所收作品篇名以下皆标示出处，囊括大量文人别集、多种地方诗文总集、小品文选本及新鲜出炉的同类出版物，看似作品来源丰富繁多。

关于《新语》初编，罗琴在《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一文中，将《新语》初编与《新钞》一选、《初征》二书所收作品进行细致比对，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新钞》一选与《初征》是《新语》初编主要的文献来源。具体而言，其一是将《新语》初编各卷所有篇目与《新钞》一选及《尺牍初征》分别核对，据其统计，《新语》初编收尺牍 645 篇，共有 243 篇来源于《新钞》一选，占作品总数 37.7%，其中有 168 篇不注明真实来源；共有 158 篇来源于《尺牍初征》，占作品总数 24.5%，其中有 94 篇不注明真实来源。其二是通过《新语》初编沿袭《新钞》一选但不注明真实来源的作品与《新钞》所收对应作品进行比勘，还据《新钞》所标示出处进一步核对文本，印证了《新语》初编虽然少部分篇目标明来源于《新钞》一选，但仍有更多篇目隐瞒出自《新钞》一选的事实，加之校勘不精等缺陷，将其定性为恶劣“盗版”。其统计数据直观地展示了《新语》初编各卷作品来源于《新钞》一选及《初征》总篇数、所占全书总篇数百分比，以及出自二书但不如实标注出处的篇数。以上罗琴关于《新语》初编主要沿袭《新钞》一选与《初征》的意见，笔者完全赞同。《新语》初编所收作品超过六成来自同

①汪淇、徐士俊评笺：《尺牍新语初编·例言》，康熙二年（1663）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②汪淇、徐士俊评笺：《尺牍新语初编·例言》。

类出版物,其原创性^①不高自不待言,而以篡改来源伪饰原创,更是不可取。不过,正如陈广宏教授所指出的,利用已有资源,进行袭意类仿、切割置换、增插删改等编纂出新的著作,是晚明商业出版的常态,动态化考察及书籍文化史意义的挖掘之于这类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②。编纂者为躲避纠纷而采取多种手段来掩盖不当转用痕迹的现象在各体选本中多有体现,《新语》初编可以说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例^③。罗琴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新语》初编各卷取自《尺牍新钞》一选与《初征》篇数及所占比例,不过《新语》初编具体如何利用包括《新钞》与《初征》在内的刊本著作,仅在短短二月之内迅速“生产”出一部畅销尺牍选本的过程以及三编之发展关联,尚须进一步考察。

首先是设立类别。《新语》初编共设二十四类,依次为理学、政事、文章、诗词、庆贺、游览、赞美、荐举、怀叙、规箴、旷达、感愤、嘲讽、翰墨、慰问、邀约、钱送、请乞、馈遗、隐逸、释道、技术、家庭、闺阁。《新语》初编以类别编排作品,与《初征》《新钞》一选各卷以人物为序次不同。《新语》初编分类法有《初征》卷首所列《分类便查纲目》的明显印记^④。《新语》初编“政事”“庆

①选本的“原创性”,指所收作品在该书刊行以前尚未以刊本公开或不易获见,这类作品所占比例越大,其“原创性”越高。

②陈广宏教授详细考察了在近世阶段的大众社会曾产生过较大效应的诗法类著作如何利用已有的诗法类著作这一公共资源加以编刊的动态过程(陈广宏:《从〈诗法要标〉看晚明诗法著作的生产与传播》,《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第153-163页)。另外,龚宗杰博士也指出晚明文法著作主要利用现有资源加以整合制作的性质(龚宗杰:《晚明文法汇编的编刊与文章学演进》,《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第81-92页;《明代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

③笔者发现,《新语》初编问世前一年汪淇所刊《王百谷先生谋野集》四卷实际上为盗版,正文与注释皆与明末《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几乎一致,只是对书名作部分删改。在该书题词中汪淇却云“今特广罗诸书,详释附后”(《王百谷先生谋野集》四卷,康熙元年蛸寄楼刊本)。遗憾的是,对此《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社,1983年,第227-229页)中该书条目之著录,Ellen Widmer、David Patinson等先行研究皆无指出,且相关论述多有疏误。此外,上原究一《明末の商業出版における異性書坊間の広域的連携の存在について》则指出汪淇蛸寄还读斋康熙元年刊本《增定便考万病回春善本》八卷为对周氏刊本的不正当盗版(《东方学》第131辑,2016年,第65-66页)。

④《尺牍初征》卷首虽列分类纲目及条目,其实质与《尺牍新钞》一选相同,各卷卷首目次及正文作品编排皆以作者为序次,而全书卷首分类纲目与条目显然为作品编成后所加。

贺”“馈遗”“释道”与《初征》完全一致;“赞美”“荐举”“怀叙”“规箴”“感愤”“嘲讽”“邀约”“钱送”“家庭”分别与《初征》之“称美”“荐引”“叙述”“规诫”“感颂”“嘲谑”“期约”“迎送”“婚姻”近似;“慰问”合并《初征》中之“慰唁”“音问”,“请乞”合并其“属托”“免倩”“求索”“借贷”等类别;“文章”“诗词”“翰墨”由《初征》之“文艺”分化而来;新设“理学”“游览”“旷达”“隐逸”“技术”“闺阁”等类别^①。以上可见,《新语》初编从《初征》卷首《分类便查纲目》借鉴分类法,部分作了归并、分化、新增等调整,如张潮所言“赖古堂《藏弃》、《结邻》诸选,汇其人之文,专系于姓名之下。蝸寄斋《尺牍新语》三编,别其文之类,分叙于卷页之中,固云整整齐齐,未觉疏疏落落”^②,使三编所收近二千通尺牍秩序井然,且相较于《初征》之实用性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

次之,从刊本著作中采撷作品,对作品出处进行标注,再根据内容适度归入相应的类别。关于作品来源的刊本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类:其一,新近编刊的同类出版物《新钞》与《初征》;其二,主编汪淇等人在内的杭州及周边文人的文集与选本。前者正如同罗琴所指出的,《新语》初编盗用《新钞》一选与《初征》,作品来源的标注不符合事实。《新语》初编主编也掌握了时人尺牍选本在清初各体文学商业出版中所具有的市场潜力,徐士俊曰:“次日汪子憺漪与余商尺牍之事,余曰:‘十年以来,诗古文词已称灿漫,而惟此一种尚在含苞,是可举而行也。’”^③“含苞”意味着尺牍出版即将迎来繁荣局面,同时也意味着有必要将选本迅速投入市场,并且要尽量满足“新”的阅读需求,故而《新语》初编将取材目标瞄准了新鲜出炉的同类出版物《新钞》一选与《初征》,以此二书为主要材源。该尺牍选本所收绝大部分作品篇名以下皆明示出处,可以推想这种意识应当在作品搜集之初早已萌生。下面以《初征》卷五的十二篇作品在《新语》初编各卷的分布情况、出处标注与异文情况为例(详见下表1),来尝试寻绎《新语》初编从取材到编纂实态的一些线索。

①《新语》三编从类别设置上体现出若干新质素,例如 Ellen Widmer(魏爱莲)曾在“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0, no. 2, 1989, pp. 1-43)一文中指出“《尺牍新语》乃第一部设立‘闺阁’专题尺牍选本”,以其为线索考察十七世纪中国才女的诗文交游活动。

②张潮辑:《虞初新志》卷首,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

③徐士俊:《尺牍新语序》,汪淇、徐士俊评笺:《尺牍新语初编》卷首,康熙二年(1663)刻本。

表 1

尺牍篇名	作者	《新语》 卷次	《新语》所 示出处	其他出处	异文
与熊子牙	谭元春	三 文章	冰雪携	《鹄湾未刻 古文》	《新语》《初征》“闭门”， 《鹄湾未刻古文》“闭 户”
答李漱甫 酌甫	谭元春	廿四 闺阁	岳归堂	《鹄湾未刻 古文》	《新语》《初征》“读札中 语甚妙”，《鹄湾未刻古 文》“读札至‘佳人难得， 正从此中恐其不能珍重 耳’，此言甚妙”
答赵岐阳	魏大中	十四 翰墨	文集选	《藏密斋集》	《新语》“见寄”，《初征》 《藏密斋集》“见惠”。 节选《藏密斋集》
答潘生	冯梦祯	八 荐举	初征选	《快雪堂集》	节选《快雪堂集》卷三八 《答潘去华》
简夏怀碧	王思任	十 规箴	/	《文饭小品》	《新语》“针”字无圈， 《初征》《文饭》皆有圈
上黄老师	王思任	六 游览	文饭选	《文饭小品》	/
简周玉绳	王思任	二 政事	文饭选	《文饭小品》	《新语》“以及会典律 例”，《初征》《文饭》“我 朝会典律例”
再 简 周 玉绳	王思任	二 政事	文饭选	《文饭小品》	《新语》《初征》“再简周 玉绳”，《文饭》“简周玉 绳”
与同志	缪 沅	十 规箴	初征选	/	《新语》省去《初征》“甚 可畏”之后数句
与符曾侄	缪 沅	廿三 家庭	/	/	/
答潘虔台	艾南英	八 荐举	天庸子集	/	/
第后東德 升诸兄弟	周顺昌	一 理学	冰雪携	/	《新语》“第后東诸兄 弟”，《初征》《冰雪携》 “第后東德升诸兄弟”

上表显示,《初征》卷五的 12 通尺牍被分散于《新语》各卷中,确实如罗琴所指出的存在不注真实来源的问题。具体而言,《新语》初编将目标瞄准同类出版物《初征》后,从其各卷割取若干篇作品,继之以对各篇出处、标题、正文

及圈点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为掩饰剿袭事实,仅少数作品如实标注来自《初征》,如冯梦祯《答潘生》与缪沅《与同志》,虽如实注明出处为《初征》,但前者简化原标题《答潘去华》,后者略去原文“甚可畏”后48字。而将更多的作品出处改为作者文集或当时流行的诗文选本。例如,王思任的3通^①尺牍标注出自作者文集《文饭选》(《谑庵文饭小品》),几乎照搬《初征》对应作品连同圈点,仅对标题、正文作细微改动。又,将谭元春《与熊子牙》、周顺昌《后东德升诸兄弟》标注为小品文选本《冰雪携》,从异文及圈点看实际上是从《初征》复制而来。而谭元春《答李漱甫酌甫》被标注为出自其诗集《岳归堂(集)》,实际上收录于《鹄湾未刻古文》,并不合乎事实,而魏大中《答赵岐阳》标注出自《文集选》,更是随意捏造。次之,根据内容将这些作品归入某一门类。如上,将原本以作者为次序编排而相对集中出现在原书中的作品,根据内容分散到类别不同的各卷之中,附注被篡改过的出处,看似经过多方搜集所获,使整部尺牍选本呈现出来源丰富的效果,其消除剿袭痕迹,伪饰原创的意图非常明显。然后,撰写评语,附于各篇尺牍文末。《新语初编》评语多是汪淇、徐士俊为主的编辑对内容抒发的感慨,与续编尤其是广编评语常常披露尺牍往来双方身世背景、交游关系及其评点人之间的交谊不同,这显然是由作品获取方式的差异所致。

另外,部分作品则出自主编汪淇、徐士俊及其朋辈在内的杭州及周边文人之手。其来源为个人文集或地方诗文总集。《新语》初编收汪淇作品22通,其中20通标注出自其文集《残梦轩集》,此外1通出处标为《初征二集》,1通无出处标注。收徐士俊作品15通,除《与沈虬书妹丈》无出处外,其他皆标注出自其文集《雁楼集选》,所收全部作品均与《雁楼集》卷二十“尺牍”中所收相应作品一致^②。收查望作品11通,标注出自其《大略堂集选》与《迂园稿选》。收黄周星作品8通,均标示出自其《鹏云堂稿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新语》初编第十三册嘲讽类收入徐士俊、查望、黄周星、林时对、叶生、韦人凤六人各自致汪淇尺牍共六通,分别标注出自《雁楼集选》《大略堂集选》《夏为堂稿远》(阙)《抑引堂稿选》与《笥稿选》。以上诸尺牍皆有关于汪淇入道一事:“余虚度五十九年,沉溺消耗以极,去岁始为悔悟,誓绝俗网,皈依吕祖,奉教玄师。”^③诸友对此事之嘲讽可谓严苛,查望言“学道,人世上

①另,《简夏怀碧》未注出处,当是漏注或漏刻。

②徐士俊:《雁楼集》卷二十,《清代诗文汇编》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3-410页。

③《证道碎事》,载汪淇编:《吕祖全传》,中华书局,1981年,第82页。

最便宜事……吾兄专捡便宜做去”^①,韦人凤言“闻学道者有九患……先生少年驰情声伎,唯艳冶是耽,今淫业虽除,淫根果悉未断耶”^②云云,且写信人还相互评点这些写给汪淇的尺牍,黄周星最后总结:“九患三疑,切中学道人病痛……卯友于此自应猛下一鞭。”^③作为友人,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汪淇修道,所嘲讽的是汪淇没有涤除妨碍修道之淫根,且亦不能因修道而不顾家人。紧接此六通尺牍,同卷收汪淇《答诸子书》。该尺牍无出处,很可能是汪淇为编入选本而特意撰写的“公开信”。

可见,《新语》初编所收作品,作者若为明末政治人物、学者名士,则多从《新语》《初征》剽取,而尚存世且活跃在杭州及周边的人物,则因其文集易得而具备直接选录的条件。《新语》初编收录主编及其朋辈等杭州及周边时人尺牍作品,虽然相比取资于同类出版物的作品只是小部分,但其中不少作品所载文集如汪淇《残梦轩集》、查望《大略堂集》、黄周星《鹏云堂稿》、释正岳《谷鸣集》等别集,《尹胜集》《仰苏斋杂集》《抑引堂稿》《巢青阁别录》等诗文总集似已不传于世,因而《新语》初编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此外,编辑交游圈文人尺牍以选本形式公开及流传,不仅创造了文字流传后世的机会,也提供了相互标榜交游关系的平台,这就促使很多文人踊跃向《新语》续编投稿,甚至加入到其编纂活动中。

二、编辑群交游网络的形成:《新语》二编、广编之编纂策略^④

《新语》初编问世四年之后,其续编(二编、广编)康熙六年、七年被接连推出。罗琴指出:“《新语》对《新钞》的沿袭率呈直线下降趋势,从初编37.7%到二编21.5%再到广编4.4%,可见《新语》有逐渐成长并独立的过程。”^⑤论其原因,罗琴指出《新语》二编和广编有自己独立稿件来源。那么,一介地方书商如何获取独立稿件来源,又如何使广编抢占市场先机,却未闻其详。本小节旨在详细考察《新语》二编、广编所采取的编纂策略。

①查望:《東汪憺漪》,《尺牋新语初编》卷十三,康熙二年(1663)刻本。

②韦人凤:《東汪憺漪》,《尺牋新语初编》卷十三,康熙二年(1663)刻本。

③黄周星评叶生《東汪憺漪》,《尺牋新语初编》卷十三,康熙二年(1663)刻本。

④笔者曾在拙作《清初杭州的文人ネットワークと〈尺牋新語〉》(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2月,中文版发表于“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12月)中对清初杭州的文人交游网络与《尺牋新语》的系列出版问题作过考察。

⑤罗琴:《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牋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牋新语〉三编纠葛详考》,第48页。

汪淇在向吴雯清求取尺牍作品及《新语》广编序时描述了来稿状况：“弟拙选亦遍寰区，兹《二编》而起者为《广编》。小斋中四方麋至之牍，虽如云如雨，如墨如荼”^①，汪淇的言语未免自夸，但是由此可以推知续编能够实现稿源独立，应当与初编的广泛流传所形成的影响力不无关系。来稿远远超过《二编》稿件需求，因而《广编》应运而生。来稿以未刊作品为旨趣，最初在《二编》凡例中被阐明：“集中所载诸牍，大约抄本为多，或远地邮筒，或同乡手授，或藏之篋笥，或传诸友朋。”^②“抄本”凸显作品未经广泛流布之特性，旨在强调选本的“原创性”。

《新语》续编能获取如此充足的来稿，所倚赖的是一个以杭州为据点，由编辑群所连结而逐渐形成并扩大的流动性交游网络^③。此网络在初编编纂时也初现雏形。初编卷一卷首题“西湖徐士俊野君/汪淇懔漪评笺”，次“同学查望于周/骆仁埏方流参订”，全书“参订”者为查望等二十五位。评点主笔汪淇、徐士俊，查望、黄周星、叶生与林时对等人亦参与评点。并且，初编的主编、参订人及评点者中亦有参与二编、广编编评活动者，且以写信人、收信人身份出现。相比初编，二编编辑群规模明显扩大，卷一卷首“西陵汪淇懔漪笺定/徐士俊野君全评”，次“友人吴雯清方涟/查望于周参论”。全书“参论”者共计四十八人，评点者三十七人。广编与二编共享编辑群人脉资源，全书二十四卷目录后题“西陵汪淇懔漪父/吴雯清方涟父全笺定”，各卷

①汪淇：《与吴方涟》，汪淇、吴雯清笺评：《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十八，康熙七年（1668）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②《凡例》，汪淇、徐士俊笺评：《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康熙六年（1667）刻本。

③杨玉成教授在《小众读者：康熙时期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批评》一文中，以《新语》等六部文类不同的书籍为例，讨论康熙时期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产生的若干重要而微妙的变化。作者认为这六部书籍所保留的评点，呈现出康熙时期的读者以某种文人圈子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新语》而言，“初编的编辑过程较为简单，二编后开始趋向复杂，最奇特的现象是复杂的编辑群，主编之外还有二十四个参论者，三十五个评点者，相当特殊。”（杨玉成：《小众读者：康熙时期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1年第19期，第55-108页）关于《新语》三编的编辑群问题，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初编中编辑群的交游网络已初现雏形。其二，广编在作品搜集与编法上的转变更为彻底，且将编纂过程记录在同书中的现象较为罕见，与二编在来稿与编辑群人员上共享资源，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亦是该系列尺牍选本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遗憾的是该文讨论对象不包含广编。杨教授的观点启发笔者进一步将《尺牍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探究该系列尺牍选本从简单趋向复杂的背景、编法之具体转变及其对选本面貌、文体观所形成的影响，由此而深化对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脉络及文体观等问题的认识。

卷首又题“西陵汪淇檐漪笈评”、“同学徐士俊野君/黄周星九烟参定”,另篇末评点者共计超过四十人。显然,编辑群交游圈呈逐渐扩大趋势,但同时又处于流动状态。

此编辑交游网络之召集人为《新语》三编主编汪淇。汪淇(1604-1668之后),又名象旭,字右子,号檐漪,皈依道教后改名象旭,别号残梦道人。祖籍安徽休宁,长期寄居杭州,著有《残梦轩集》。汪淇经营刻书业,以“蜗寄楼”“还读斋”为书坊名刻书多种,除《新语》三编外,还有《吕祖全书》《西游证道书》《济阴纲目》《武经七书全文》等^①。《新语》三编作品的搜集、编选、评点、刊刻诸阶段,汪淇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虽然与周亮工在文人社会中所具有的人脉资源与影响力不可相提并论,但汪淇凭借编刊《西游证道书》《尺牋新语》初编等书而在顺治康熙初年的杭州文人圈子中声名鹊起,个人交游大为拓展。汪淇编刊《新语》最初与仁和名宿徐士俊相商并得其鼎力相助。徐士俊(1602-1681),字野君,号西湖散人,浙江仁和人。甲申之后,绝意仕进,著有《雁楼集》。工词曲,有多部传奇作品传世,与卓人月共编《古今词统》、《诗餘广编》等书^②。徐士俊在《新语》三编中发挥的作用仅次于汪淇。

此编辑群交游网络还包括以西泠十子为代表的清初杭州文学名士群体。汪淇与陆圻、毛先舒、沈谦、吴雯清、严沆等人多有长达数十年之交谊。《新语》续编之稿件搜集、编纂、评点得到他们的热情协助。汪淇在评语中对此多有记录。“稚黄为吾党推重,兹集得其搜拔最富,诚盛举也。”^③毛先舒(字稚黄)不仅以写信人、收信人、参论人、评点人等身份出现在《新语》续编中,其为二编搜集作品最多。“陆子丽京极赞去矜之才,吾党推重,所赐多札,甚为《广编》之光矣。”^④沈谦(字去矜)亦慷慨提供多通尺牋。又“余与锦雯缔交三十余年,为人落落穆穆,不存行迹,而胸中有镜光,下笔必犀利。近从岭西寄此一篇,已剖尽奥旨,使天下言文章咸畏缩,而不敢矜直作龙门楷模观矣。”^⑤吴百朋(字锦雯)身在岭西将寄给岭南陈衍虞(号园公)尺牋(之副本)投寄给杭州的汪淇供其编刊尺牋选本。“二编之后,同颢亭在且庵座

①陈恩虎:《刻书家汪淇生平考》,《文献》2005年第3期,第84-91页。文革红:《汪淇“蜗寄”及其所刻书籍考》,《文献》2006年第3期,第79-83页。

②陈欣:《徐士俊的名号与生卒年月》,《文献》1992年第1期,第265-268页。赵彦军:《徐士俊生平事迹考略》,《文教资料》2011年12月下旬刊,第169-171页。

③汪淇评毛先舒《与王丹麓》,《分类尺牋新语二编》卷三,康熙六年(1667)刻本。

④汪淇评沈谦《答毛稚黄填词》,《分类尺牋新语广编》补册,康熙七年(1668)刻本。

⑤汪淇评吴百朋《与陈园公论文章》,《分类尺牋新语二编》卷三,康熙六年(1667)刻本。

间论及尺牍,极承指教,兼惠多篇。其订《广编》之选,时当春仲……即示序言为弁冕。”^①收信人颢亭即严沆(1617-1678),字子餐,号颢亭,浙江余杭人,明太常严太纪孙,顺治十二年进士,官户部侍郎,至总督仓场,明末杭州读书社及登楼社成员^②。严沆对《新语》编纂颇感兴趣,不仅提供自己往来尺牍,也参与尺牍选本的编订评点,还为广编作序。此外,杭州作为清初明遗民聚居地,有不少流寓或游历者如福建籍的林嗣环、湖南的杨履吉、歙县的吴雯清、新安的程奕仙等人,以种种契机加入《尺牍新语》编辑群交游网络。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新语》的编刊得益于杭州书香世家、文学名士群体包括流寓、到访杭州文人的热情支持。

二编、广编编选策略的又一转变,则是在序、卷首小引、评点等副文本乃至编辑群之间往来的尺牍作品中,向读者披露所收作品来源及选本的编纂过程,补充作品阅读的语境。兹以申蕙《答归素英高夫人问作书法》及其篇末评点为例:

近代书家,专工娇美,求其点画合度,步骤得法者,绝少焉。妹幼姻母训,长解书义。大约执笔贵法,运笔贵灵。临帖不贵露而贵藏,用墨不尚浓而尚鲜。去狂怪怒张之习,趋平淡古雅之势。莫以巧取拙,须以拙取巧,勿以生用熟,当以熟用生。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太肥则伤意,太瘦则伤法。婉婉焉视之不足,稜稜焉视之有馀。真有真态度,行有行态度,草有草态度。以斯数语,慎思笃行,虽未必超入晋室,亦可卓然自立矣。妹才谫劣,深愧书名少露,恐违雅意,敢此妄陈,笑笑。

徐野君曰:沈子中立以尺牍数首寄余,附载夫人兰芳手笔,真可称大家举止,名士风流也。申夫人,别号诗农,为吴门申奇生刺史第三女。善诗文、工书法,有《涤砚亭帖》、《逢云阁诗》、《花下吟》、《绣馀草》诸刻行世。与泾湄黄月辉、花村归素英、吴门许瑶清、王凤翔诸夫人为诗文友,嘉兴陆介畹、寒山赵芝贵、海宁李是庵为丹青友,虞山吴氏华山、携李徐仪静、江南顾招霞为书法友,梅里女禅师一揆为谈禅友。其论书法精妙处,虽卫夫人《簪花格》,何以过之。余同檐滴不胜击节,附载以传。^③

作为副文本的评点在篇幅上甚至略超作品本身。读者由评点可知该尺牍流通之路径,即由作者夫君沈中立向兼任主编及评点者徐士俊投稿。

评点者徐士俊与主编汪淇对此作品“不胜击节”,极为赞赏,因此增补入

①汪淇评张右民《与严颢亭书》,《分类尺牍新语广编》补册,康熙七年(1668)刻本。

②〔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汪淇、吴雯清笺评:《分类尺牍新语广编》补册,康熙七年(1668)刻本。

册,望其流传后世。若无此评点,再移除显示文体信息之题目《答归素英高夫人问作书法》及“妹”这一透露性别之称谓,便是一篇隐去作者身份与文本生成语境的精妙书论。申蕙在历史文献中可谓沧海遗珠,关于申蕙的记载大抵不出以下两则材料:朱彝尊辑《明词综》卷十二所收申蕙词作附小传:“申蕙,字兰芳,长洲人,嘉兴沈某室,有《缝云集》。”^①又周铭辑《林下词选》卷十收申蕙词作附小传:“申蕙,字兰芳,苏州人,申胤荣女,有《缝云阁集》。”^②徐士俊关于申蕙的这则评点可谓翔实。由此可知,写信人为吴门申奇生第三女,即万历朝首辅申时行曾孙女申蕙。申蕙出身名门、诗文书法等才艺兼备,著述颇丰,以诗文、书画、谈禅等为介广交一时名媛。该尺牍写信人之身世背景、才艺著述、交游关系等具体鲜活的信息帮助读者获得独特的尺牍文体阅读体验。正是编辑群借助其交游网络的人脉资源获得大量尺牍佳作,他们与尺牍往来双方相互熟知的有利条件,为尺牍作品撰写评点,提供了尺牍文体阅读鉴赏的特定语境。这与明末以来尺牍选本评点以字词、典故的注解不同,也有异于《初编》主观感慨式的评语,转向补足尺牍作品阅读语境的编选旨趣与策略。

篇末评点中不时出现关于尺牍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经过的记录。例如,汪淇在纪映钟《寄林铁厓》篇末的评点中如此记录:

汪懋清曰:《广编》之役,原与野君、九烟两君子共事,未几各返珂乡,而方连又发广陵之棹,于周尚且留白岳之游。投赠云集,翻阅为烦。幸逢林铁瓮以古貌冰心,吐奇相示,广罗佳牍,方得编目成书。戏语铁瓮曰:“此后即有佳文,断难入集。”遂偕游荷花深处,两人谈心论道,致足乐也。忽有飞棹而来者,则长安纪伯紫先生札也。其急开视,情词恺切,笔力高宏,非真知己不肯为此言,非真名流亦不能作此语。乃于目录之外,更补斯篇,并如干首。倘亦选牍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耶。是余一片响慕心,漫识于此。尤恨琳琅诸牍,捆载盈筍,衰迈搁笔,殊为怅惜之深也。^③

这则评点包含了以下信息:其一,“情词恺切,笔力高宏,非真知己不肯为此言,非真名流亦不能作此语”,确是针对尺牍作品本身之评价。其二,回顾广编的编纂始末、收信人林嗣环(号铁厓)对广编之贡献及在此过程中与主编·评点人汪淇之交游,这方面内容几乎占评点文字九成的篇幅。徐士俊(字野君)、黄周星(号九烟)和查望(字于周)等人自初编协助汪淇展开尺牍

①朱彝尊辑:《明词综》卷十二,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

②周铭辑:《林下词选》卷十,康熙十年(1671)周氏宁静堂刻本。

③汪淇、吴雯清笺评:《分类尺牍新语广编》补册,康熙七年(1668)刻本。

作品的搜集校对与编目工作,但他们都只是短暂停留于杭州。吴雯清(字方涟)虽为广编作序,但与查望皆未如期赴编选广编之约。大规模来稿的校阅、编目、评点工作十分繁琐,幸得收信人林嗣环鼎力相助,方才顺利完成,故以评点形式表达其感激之情。其三,评点还向读者透露了这通尺牍在公私领域流通的全过程。收信人在与友人(主编汪淇)于荷花深处谈心论道之时,突然手接由飞棹传送来自长安的阔别七载的友人纪映钟尺牍时极其惊喜。并且,还说明在广编目录已编成的情况下,仍将其增补入选的缘由,揭示了尺牍作品从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即从收信人处至编入选本的经过。尺牍选本的主编见证了尺牍往来双方的情谊,转而传达给读者。由此,作品的获取、选本的编纂、编辑人员流动频繁给该尺牍选本编纂带来困难,以及编选者如何克服困难的过程,皆以评点的形式生动活泼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以上考察了《新语》二编、广编编纂策略的转变。所收作品以未刊作品为主,还通过评点等副文本来呈现作品的出处及该书编纂始末。虽然不能否定其存人存史之意图,但更真实的动机,恐怕仍与该选本作为商业出版的性质紧密相关。即通过对所收作品来源与该选本编纂过程、细节的透露来凸显该选本的原创性。

三、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编法之新变

《新语》初编以同类出版物为主要材源、稍加选家等时人作品的编法,在明末以来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最典型的是历代名公尺牍选本多在以复古派领袖王世贞增辑《尺牍清裁》(六十卷补一卷,以下简称为“《清裁》”)等同类出版物为底本的基础上,稍加若干时人作品。例如,王穉登辑《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万历二十八年刻本)、沈佳胤辑《翰海》(金闾徐含灵崇祯三年序刻本)、旧题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笺》(天启刻本)等明末尺牍选本,所收明以前作品多取资《尺牍清裁》。余晓栋根据《古今振雅云笺》(以下简称为“《云笺》”)所收明以前作品 116 篇及夹注均能在《清裁》中找到,推测其底本为《清裁》可能性最大;关于选本中的明人尺牍,则以所收袁宏道作品部分未见于别集,作出亦从选本中二次选辑而来的推断。笔者赞同余氏对该选本编法及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过,余氏指出,“因明人尺牍选本没有像《尺牍清裁》一样的权威版本,故很难考究《古今振雅云笺》所选明人尺牍所据之底本”^①。实际上,文人别集、尺牍别集、历代尺牍选本、时人尺牍选本、诗文总集及未刊稿等流通形式不同的尺牍,皆可能成为选本的作品来源。例如,

^①余晓栋:《〈古今振雅云笺〉伪书考——兼谈明清尺牍文选之商业化特征》,《浙江学刊》2016年第3期,第106-107页。

《云笈》所收明人王穉登尺牍计 39 通皆来自《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以下简称“《汇编选注》”),依据有二:其一,对应作品文字几乎一致,皆为《谋野集》等王氏尺牍别集作品之节选;其二,注释大致与《汇编选注》相同,略作增删损益。兹以《云笈》卷八《炭谢友人》为例:

乌薪远贻,寒士之庐,煦然挾纒,于以卒岁,曷忧黑貂之敝哉。

煦然挾纒:煦,和暖也。纒,细绵也。煦然,绵之温润也。楚伐卫、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抚而勉之,皆如挾纒。卒岁:《诗经》:“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黑貂之敝:李兑遗苏秦黑貂裘,游于秦邦,秦王不用,黄金百斤尽,黑貂之裘敝。^①

《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卷一《答龙安惠炭》:

乌薪远贻,寒士之庐,煦然挾纒,于以卒岁,不忧黑貂之敝哉。

乌薪,炭也。煦,温润。纒,细绵。挾纒:楚伐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抚而勉之,皆如挾纒。卒,终。黑貂之敝:李兑遗苏秦黑貂裘游秦,秦不能用,黑貂裘敝。^②

《云笈》所收《炭谢友人》作品正文及注释出自《汇编选注》,文字略有异同,改换篇名,隐去收信人信息,或是因选本以尺牍写作指南为定位,故此信息无关紧要;或通过改头换面抹去与《汇编选注》之关联。同卷所收《兰布谢友人》、《新粟谢友人惠》分别与《汇编选注》卷一《答孙汉阳惠兰布》、《答朱在竹惠新粟》一致,对所收作品正文及篇名、注释之处理大抵皆相似。沈佳胤辑《翰海》收王穉登尺牍 74 通,可以推测亦以《汇编选注》为主要材源,该选本对作品原题目稍作改动,但保留收信人信息,与《云笈》处理手法有所不同。

由此可以一窥明末以来历代名公尺牍选本的一般编法:所收明以前作品多以《清裁》为底本;而明代部分则收入选家在内的时人作品,其来源包括各种尺牍选本。从上述王穉登尺牍作品在不同选本中的收录可以看出明末坊间编纂尺牍选本对同类出版物的利用情况。而王穉登编纂《汇编选注》时将己作以节选形式收入该尺牍选本,其来源当为先行于该尺牍选本的《谋野集》等王氏尺牍别集。其背景乃嘉靖、万历以来山人以尺牍相标榜风气的盛行。当时活动于官僚体系以外的山人热衷于将个人往来尺牍以专集、选本等形式出版。王穉登生前不仅就将所作近 2300 通尺牍结集出版,接连推出

①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笈》卷八,明末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②王穉登辑、俞肇光注:《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卷一,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三种尺牍别集,还编有数种尺牍选本^①。《汇编选注》就是抄撮《清裁》来获取选本中古代部分的作品,加入自己及友人等时人尺牍,以此将己辈置于古今名公之列,且标榜个人交游关系之动机不难察觉。而《汇编选注》这样的尺牍选本,又为其后出版的《翰海》《云笈》等多种尺牍选本编纂时辗转利用。究其原因,尺牍本为私领域流通传递信息的实用文体,写信人未必留稿^②,收入文人别集者更是少见,收信人也未必收藏原件,因此尺牍作品的搜集成本相当高。在书籍出版利润刺激之下,以同类尺牍选本为主要来源的编法因成本低、效率高而多为明末以来尺牍选家所采用。

《新语》初编以同类出版物等刊本著作为主要来源,并收主编汪淇、徐士俊与朋友往来尺牍的编法与《汇编选注》等明末尺牍选本十分相似。《新语》初编招致对手如此强烈的不满,某种意义上反映该选本在商业上所获得的成功及当时尺牍选本所具有的极大的阅读需求。不过,《新语》续编在序言、凡例及评点等副文本中如此强调所收作品具有“未刊”“抄本”等特质,多少反映了编者意识到同类出版物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惟有作品之“新”名副其实,才能使续编具备雄厚的竞争力,因而续编采取了若干新的编纂策略,最突出的是充分利用编辑群交游网络的人脉资源广搜符合“新”之阅读需求的时人佳作,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新语》三编在取材与编法上所呈现的新变(或罗琴所谓的“独立并成长”)过程,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发展的脉络。

四、尺牍选本盛行之下的文体观念演化

尺牍向来被视为“小道”“小技”,极少有针对尺牍文体的论述。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尺牍文体批评最重要的形式与资源。伴随

①王穉登生前出版《谋野集》十卷(江阴郁氏玉树堂万历十六年刻本)、《谋野乙集》十卷(万历十九年刻本)与《谋野丙集》十卷(万历自鉏园刻本)三种尺牍别集,编有《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四卷(万历二十八年刻本)、《海内名公云翰玉唾新编》十二卷(日本尊经阁藏万历刻本)、《赤翰宝珠编》十卷(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二十八年徐应瑞刻本)与《新镌李九我注释名公分类书柬鸿雁传音紫燕泥金捷锦》六卷首一卷(日本东北大学藏万历集义堂刻本)等多种尺牍选本。

②例如林嗣环《简汪懋漪》曰:“环得意之札颇多,然兴会所至,伸纸急就,不留稿,亦无稿可留,所以数月来,无一字可报先生也。”(汪淇、吴雯清笺评:《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十八,康熙七年(1668)刻本)林嗣环致汪淇尺牍,说明近来数月因没有留稿而未能提供投稿作品。

着尺牍选本的盛行,尺牍文体观念也呈现一定的演化趋势。

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编刊热潮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王世贞《清裁》的盛行。虽然《清裁》以“尺牍”为题名,但所收作品,笺表诏奏、国政辞命、字书法帖、夫妻慰问、神仙交游等文体杂混其中。这些作品当中有不少无论是在当时人还是现代人看来都与“尺牍”概念无法相容,甚至不能称之为“尺牍”,可以说其尺牍文体观非常驳杂。但是,《清裁》因增辑者为当时文坛执牛耳者王世贞而盛行其时^①,成为很多历代尺牍选本的重要来源。这些尺牍选本“古”之部分因剿袭《清裁》也颇显混杂;但其“今”之部分则大量收入活跃于当时的山人墨客往来尺牍,因而选本中出现不同于《清裁》的新质素。这些尺牍选本的编者多为明末山人,自身追求风雅生活与艺术趣味,故对所收尺牍作品加以剪裁,从而呈现出短小精美的审美特性。因此,这类尺牍选本可以视作收录单一文体的小品文选本,其代表有王穉登辑《汇编选注》、沈佳胤辑《翰海》、旧题徐渭辑《云笺》等。

前文已指出《云笺》卷八所收《炭谢友人》与《翰海》卷四交际部所收《谢龙龙安》,皆出自王穉登辑《汇编选注》卷一所收《答龙龙安惠炭》,而该篇为其尺牍别集《谋野集》卷一《答龙龙安》之节选,原文如下:

获公尺一,何翅十部从事邪,何况其累累也。其宠施之过当,不肖曷以报国土哉。郎君英英,如明月珠子,夜光的砾,异时当观其照乘耳。以书请善化公。护其外家惟谨,想其枕获高矣。乌薪远贻,寒士之庐,煦然挟纊,于以卒岁,不忧黑貂之敝哉。手疮甚,搦管流血被腕,欲书近作奉览,且不能。俟文生北还,当缮写盈卷。^②

经王穉登自己剪裁后只剩下划线部分,原文中言及写信人手疮严重,书写时甚至手腕流血等不体面的内容在节选本中消失,虽是只言片语,却连用典故,展现出精短典雅的趣味。

清初的尺牍选家多在选录标准与编纂旨趣上标举有异于前代尺牍选本的“新”特质,但并不排斥明末以来尺牍文体崇尚精短隽美的审美趣味。例如,《新语·凡例》阐明其宗旨曰:“兹选以新颖古韵为主,爽处似噉哀梨,艳处如披蜀锦;春莺晓啭,秋蛩夜鸣。即数行半幅,已令心旷神怡,若长篇大

①郑利华指出:“隆庆五年(1571)王世贞完成了大型尺牍总集《尺牍清裁》的编纂,作为《古今诗删》之后,‘后七子’传播古文辞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学师古的范本……王世贞编选这部历代尺牍总集的目的,显然是藉此来推行他的古文辞创作法则。”(郑利华:《王世贞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08-209页)

②王穉登撰:《谋野集》卷一,江阴郁氏玉树堂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

章,论堪不朽者,间为采录,然不敢多载也。”^①四库馆臣亦以“大抵不出万历以来纤仄之派”^②论《新语》所属流派。《新语》三编确实收录不少篇幅短小的作品,但是不同程度收录为数不少的“长篇大章”,且呈递增趋势,这又使《新语》呈现出不同于明末尺牍选本崇尚简短之旨趣。

清初尺牍选本所呈现出的文体观念转变,集中表现在“尺牍”概念的扩容。尺牍统摄了较传统意义上之“书”文体,成为更加宽泛的文体概念。一般别集中,“书”是文人非常重视的文体类别,实际上是被当作古文加以创作;而尺牍则不然,是往来应酬、一时兴会之作,极少留稿并收入文集。清初新刊的《初征》《新钞》《新语》《兰言》《写心集》诸部尺牍选本,都不同程度收录了“书”文体作品。就《新语》而言,二编、广编各门类都不同程度收入“书”体作品,尤以“理学”“政事”“文章”“诗词”“嘲讽”等类别为多。《新语》三编收录清初杭州文人王晔往来“尺牍”二十八通^③。其中二编嘲讽类所收王晔《与友论道学》与其别集《霞举堂文集定本》“书”类《与友论道学书》相同,二编“文章”类毛先舒《与王丹麓》,广编“文章”类所收徐喈凤《与王丹麓》、“游览”类所收毛先舒《寄王丹麓》与补目所收张纲孙《与王丹麓论赋韵书》,分别与王晔受赠诗文总集《兰言集》“书”类《与王丹麓论选文书》《与王丹麓书》《与王丹麓叙游书》《与王丹麓论韵书》相同,明显是议论、叙事之“书”。由此可作如下引申:其一,这说明文人进行尺牍创作或文集编纂时,对“书”与“尺牍”二者,具有明确的辨体意识。其二,选家编选尺牍选本时,并不执着于“书”与“尺牍”的文体界限。就清初新刊时人尺牍选本出现不少“书”文体作品而言,一方面应当是清初文坛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古文辞观念,转而推崇唐宋古文这一主流的古文观念在尺牍文体中的推行。另一方面,恐怕仍与其作为商业出版物的性质有关。尺牍作为传递信息的应用文体,在近代邮政出现以前,绝大多数的私人尺牍倚赖个人传递,写作时间和环境都受到相当的限制,因而具有自身先天缺陷。文人作者与选家对此多有意识,周亮工编《新钞》时就明确指出这一点:“尺牍为一时挥翰之文,非关著作。或兴会所至,濡染逾涯;或繁赜交纷,拖还累幅,至有名章俊

①《凡例》,汪淇、徐士俊笺评:《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卷首,康熙六年(1667)刻本。

②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四集部“尺牍新语二十四卷”条,乾隆武英殿刻本。

③王晔(1636-?)字丹麓,号松溪子等,浙江钱塘人。王晔将所作尺牍157通结集出版,有《霞举堂尺牍定本》,将所作“书”收入《霞举堂文集定本》;此外将他人写给自己的书、启、尺牍收入《兰言集》,卷十七为“书”、卷十八为“启”、卷十九至二十四为“尺牍”。

语。”^①借用文体边界模糊的“书”体作品,或是提高尺牍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之一。

五、结语

上文将《尺牍新语》初编、二编、广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这一特定背景之下,对其作品来源及编法作一番考察。初编以同类出版物为主要材源、并收选家等时人作品,乃缺乏“原创性”之作。这种编法在明末尺牍选本中并非少见,其背景是山人墨客以尺牍及选本相标榜风气的盛行,并随清初出版业的复苏而再次兴起,《新语》初编则为一例。在追逐尺牍选本市场需求所创造的利润之下,二编、广编采取了若干营销策略,不再以刊本著作为主要资源,而借助《初编》盛行所产生的效应,利用编辑群交游网络的人脉资源,获得大量时人佳作的投稿,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该系列尺牍选本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发展的脉络。某种意义上说,同类出版物在商业竞争之下在编纂方面所采取的若干营销策略,既实现了该选本自身的成长,甚至促成同类出版物的转型,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尺牍文体创作,同时也推进了“尺牍”文体观的演化。

【作者简介】蔡燕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东亚汉籍。

①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首,朱天曙编:《周亮工全集》第8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3页。